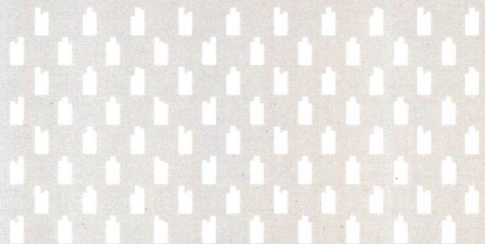


臧雷振 编译
滕白莹 校



政治科学分析 的 艺 术

方法论的分野、实验及融合



The Craf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alysis

From Divided to
Integrated Methodology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海外借

臧雷振
编译
滕白莹
校

政治科学分析的 艺术

方法论的分野、实验及融合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科学分析的艺术 / 臧雷振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117-3519-5

I. ①政…

II. ①臧…

III. ①政治学-研究方法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8745 号

政治科学分析的艺术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贾宇琰 朱瑞雪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2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69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前 言

长久以来，国内的政治科学研究进展缓慢，其中来自研究方法的不足阻碍了中国政治学走向国际的进程，削弱了中国政治学国际化的对话基础，当然，也迟滞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诉求。

我将此称为研究方法赤字，并可以将其进一步分为两类，一是显性赤字，一是隐性赤字。前者在理工科等自然科学更为常见，比如一个具体的实验器械制作方法差距，往往会带来后续研究结果的天壤之别。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赤字更多是一种隐性赤字。其表现形式较为隐秘，往往不为研究者所重视。

这种研究方法赤字首先是体现在一学科发展的内核之中。如西方政治学在 20 世纪中期开展的行为主义革命与后行为主义革命，或 21 世纪初期政治学的“改革”（Perestroika）运动，这类西方政治学科的研究方法之争就表现出学科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赤字。通过借用其他学科方法试图弥补这类赤字的举措，又进一步导致政治学缺乏能够体现出其鲜明学科特征和学科属性的研究方法。我们所熟知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包括借鉴社会心理学所谓的“行为主义运动”，继而又借鉴了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路径”，再到模仿经济学专业的“成功之道”的数理模型和实验路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知识更多是“借鉴性”而非“累积性”。

其次，这种研究方法赤字还体现在同一学科的不同国家中间。这包括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或不同时期内政治学研究方法教育要求存在巨大差异。

比如乔纳森（Jonathan Parker）发现：在强调注重学科研究深入而非通识教育的北欧更加重视研究方法的学习，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如荷兰、挪威等，而强调通识教育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则相反。且当前北美地区大学对定量研究方法课程要求，相比新世纪初不是升高而是下降了。另外，这还包括不同地区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存在显著差异，如仅就性别而言，海瑟等（Heather K. Evans, A. Moulder）和玛丽等（Mary Stegmaier, Barbara Palmer, Laura van Assendelft）两个学术团队分别发现男性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显著多于女性学者，而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女性学者则显著多于男性。

当然，虽然研究方法赤字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但是不同国家不同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不同的语言发表载体使这种赤字进一步地隐性化和固化，因为学者基于自身写作路径所撰写的作品依然在本国有较好的发表市场。如果不进行国别比较研究，学者自身而言很难深刻认识到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学科研究方法差异或差距。阿尔蒙德形象地指出：“当今比较研究者的现状就像是独自坐在不同的桌子上，默默挑选不同的食物，互不交流——甚至不承认彼此一脉相承的背景”。这极大地阻碍了上文所述及的政治学学科国际化进程。

为了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度，不同学者近年来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而我也先后撰写系列论文并出版一本专著。这本译文集更是在之前努力下的进一步推动。希望本书能够为相关学习者、研究者和政治学爱好者打开一扇了解政治学研究最新发展和实践反思的窗户。

最后，本书的形成、文本选择和翻译离不开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浦劬教授、中央编译局杨雪冬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同时，三年来，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领导多次过问书稿进展，并在翻译过程提供专业而富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同时，贾宇琰副总编、朱瑞雪编辑、闻睿博士等出色的编辑工作和细致的校对过程，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本书的错误。

臧雷振

2018年2月于东京白金台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定性研究方法及其新发展

政治学定性研究方法重要性及对其他方法论贡献

..... [美] 杰克·S. 列维 / 3

为什么历史（仍然）重要：城市政治分析中的时间和时序

..... [美] 乔尔·拉斯特 / 17

案例研究方法的五种误解及纠正

..... [丹麦] 本特·吕夫布 / 45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定性比较分析法：近 25 年发展及应用评估

..... [比利时] 阿克塞尔·马克斯

[比利时] 贝努瓦·李候科斯

[美] 查尔斯·拉金 / 63

定性比较分析：归纳性运用与测量误差如何导致可疑推论

..... [瑞士] 西蒙·哈格 / 79

第二部分 定量研究方法及其新进展

社会调查方法的现状：多元社会中挑战、困境和前沿

..... [美] 迈克尔·J. 斯特恩

[美] 依派克·宾根

[美] 唐·A. 迪尔曼 / 101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采集模式：现状与未来

..... [美] 米克·P. 库珀 / 113

测量者困境：政治学数据跨国收集中的协调失灵

..... [墨西哥] 安德烈斯·施德勒 / 134

现代化的政治学：基于模型的研究路径

..... [美] 凯文·克拉克

[美] 大卫·普利莫 / 153

政治学理论研究者的模型运用：语义陈述模型和形式化数学模型

..... [美] 詹姆斯·约翰逊 / 175

第三部分 实验研究方法兴起及反思

政治科学中的实验方法

..... [美] 丽贝卡·B. 莫顿

[美] 肯尼思·C. 威廉姆斯 / 203

为什么要在欧盟研究中采用实验研究法

..... [丹麦] 朱莉·哈斯因·尼尔森 / 220

改善因果推论：自然实验的优点与局限

..... [美] 萨得·邓宁 / 239

实验方法“黑箱”：艰难的中介效应探索

..... [美] 唐纳德·P. 格林

[韩] 河相应

[美] 约翰·G. 布洛克 / 254

实验室与田野实验结果一致性比较：社会科学实验方法评述

..... [美] 亚历山大·科波克

[美] 唐纳德·P. 格林 / 265

第四部分 混合研究方法兴起与评估

什么是混合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新方法论运动界定

..... [美] R. 博克·约翰逊

[美] 安东尼·J. 昂韦格布兹

[美] 丽莎·A. 特纳 / 291

混合研究方法对定量研究的优化和推动

..... [美] 安东尼·J. 昂韦格布兹

[美] 丽贝卡·M. 布斯塔曼特

[美] 朱迪斯·A. 纳尔逊 / 307

定性研究与田野实验的融合前景

..... [美] 伊丽莎白·列维·帕伦克 / 325

混合方法研究的批判性评估

..... [比利时] 米克·海威特

「比利时」卡林·汉内斯

「比利时」比·梅斯

[比利时] 帕特里克·昂格纳 / 340

政治学研究方法：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协调

..... [英] 克里斯丁·李斯特

[英] 凯·施皮克尔曼 / 359

政治学定性研究方法重要性及对其他方法论贡献

王世明著 王世明 著 (Guangdong)

第一部分

定性研究方法及其新发展

政治学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揭示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定量研究方法则侧重于对现象的数量关系进行描述。定性研究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它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理解政治行为的动机和过程，还能够揭示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定性研究方法的发展也促进了定量研究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使得研究者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一、导论

定性研究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它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理解政治行为的动机和过程，还能够揭示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定性研究方法的发展也促进了定量研究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使得研究者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政治学定性研究方法重要性及对 其他方法论贡献*

[美] 杰克·S. 列维 (Jack S. Levy)**

导读：伴随着自身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蓬勃发展，定性研究方法对政治学其他实证研究方法带来程度各异的影响，同时也为其他实证研究方法视野的扩展做出巨大贡献。但这种贡献仅仅较多地存在于比较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领域，而对美国政治研究的影响却不那么深刻。本篇指出定性研究方法与其他定量等研究方法的区别被夸大，且学者所批评指出的有关定性研究存在的三个显著倾向也被夸大：过于怀疑定性方法对一般性概括的可能性；过于责难定性研究在理论生产中引入限制性条件；过于强调定性方法注重用多元视角观察社会现实等。

一、导语

定性研究方法已经在政治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分析中被广泛使用，比如，

* 编译自：Jack S. Levy,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Cross-Method Dialogue in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February 2007, pp. 196 - 204. 同时适当增加部分译者评述和译者注。

** 杰克·S. 列维 (Jack S. Levy)，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政治学教授。

案例研究日渐风行。但当前学者多认为定性研究更多表现为如下特征：描述性、主观、不可复现、不可证伪、对因果逻辑不敏感，进而难以适应不断积累中的认识提升。萨托利（Sartori, 1970）对“比较政治学”中“无意识思考者”（unconscious thinkers）的譬喻，同样可以用于描述政治学界中的定性研究。

但最近十余年，我们不仅看到定性研究方法的巨大进步，而且它在实证研究方法中亦被自觉结合运用。^① 较以往而言，定性研究学者更倾向于围绕明确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同时，以此为前提，通过案例的选取及理论建构，使理论影响最大化。由于案例研究可发挥有益作用的观点正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并且，这种作用被认为不仅表现在历史（或叙事）描述上，也表现在理论的建构、发展和细化上，甚至可能在理论验证上都能有所裨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间日益融合，并且多重方法（或混合研究方法）使用的效用也逐渐得到学界青睐。

定性研究方法的进步，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学其他实证研究方法的进展，尽管对政治学三大研究领域^②的影响不尽相同。不同领域研究方法对方法论议题和元理论议题的敏感度存在差异，这也影响到跨方法交流的范围与研究实践。不同学者确认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分析它们对政治学科的影响，并致力于扩大跨方法交流的范围。不同学者对当前各自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水平进行了令人信赖的透彻分析，同时也推进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论的运用。^③ 但本篇仅展示一些当前对方法论的认知中具有普遍性的观点，本篇作者并不完全赞同过分夸大定性研究、定量或形式研究间差异的观点。

① 定性研究方法论上的进展，可能已经赶起了研究实践上的进展，因而定量研究与之的差距可能逐渐缩小。

② 在美国高校中，政治学的实证研究领域一般分为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美国政治学等三大领域。——译者注

③ 此处指在2007年第二期《比较政治学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曾经邀请多位学者对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专题探讨。

二、定性研究方法与不同研究方法融合

学者皮尔森 (Pierson) 的文章指出, 在各个不同学科领域中, 定性研究方法的发展很不平衡, 他认为在美国政治研究领域定量研究方法居于更高的地位^①, 而定性研究方法被边缘化。由于两种方法之间的分歧, 他也注意到了定性研究者与定量研究者之间缺乏持久沟通的现象。当定性研究方法在学界被边缘化同时, 学术讨论也限于相互孤立的学科次群内, 从而导致了方法论应用上的草率、自我认知的缺乏以及定性研究中缺乏高质量研究成果积累等诸多问题。当然, 与此同时, 定量研究由于缺乏吸纳定性研究方法的长处, 也存在对文献材料、限制性条件、宏观结构以及变量交互作用关注的不足。

在美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中, 定性研究学者在数量和比例上均不如比较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而且应用于元理论建构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也弱于实证比较研究, 其中的跨方法交流也仍然较少。该领域中一些定性研究方法论的领军人物, 也是统计学方法论者。例如盖瑞·金的《社会研究设计》引发了进行定性研究的浪潮^②, 亨利·布莱迪 (Henry Brady) 则致力于促进定性研究方法论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交流, 而且布莱迪和科利尔 (David Collier) 编辑的论文集《对社会调查的反思》^③ 也为这方面不同研究方法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该领域的其他统计学方法论者同样促进了跨方法交流, 因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能够互相借鉴。学者克里斯托弗·阿肯 (Christopher Achen) 曾经探讨过案例研究方法在理论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学者拉里·巴特尔斯 (Larry

① 美国政治研究领域, 定性研究文本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Paul Pierson,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February 2007, pp. 146-169.

②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Bartels) 则认为金 (King) 等人的标准因果推断模型中存在理论不完备、过分乐观、处理测量误差欠妥等局限性; 唐纳德·格林 (Donald Green) 也曾论及美国政治研究领域运用形式理性选择模型时的种种疏漏; 诸如约翰·菲里基 (John Ferejoh) 等形式理论模型建构者, 热衷于有关理性选择的元理论探讨, 而巴里·温盖斯特 (Barry Weingast) 等学者的分析性叙事研究项目试图将形式研究方法与案例研究方法相结合。

然而, 定性研究学者在促进跨方法交流上普遍建树不多, 且对实证研究的影响也很小, 而有关元理论及方法论的探讨, 也并没有深入研究实践。对于定量和形式理论研究方法来说, 这种现象早已属于常规科学^①范畴, 实践中学者不会重视元理论的探究, 不过这也对美国政治研究领域的定性研究者产生相当的影响。当研究背离了一定领域中原有的研究模板时, 学者便不得不为此构建后设性的辩护理由, 这既是出于理性, 也是为了掩盖领域内的争论。

皮尔森认为, 与美国政治研究领域不同, 比较政治及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中缺乏主导方法范式, 却大量引用科学哲学文本。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国际关系领域中, 最常引用的科技哲学家是拉卡托斯^②, 因为他的科学研究证伪主义方法论提供了一整套评价社科研究的标准。因而拉卡托斯的方法可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同时评价国际关系研究项目的进展。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尽管对元理论议题十分关心, 但并未过多关注评价标准, 除了学者鲁斯迪克 (Lustick) 运用拉卡托斯方法对李普哈特 (Lijphart) 的协商民主的研究项目进行评价这一特例。

研究方法领域内的交流使学科中的不同研究路径进一步细分。例如贝茨 (Bates) 和莱丁 (Laitin) 等人在比较政治学中的民族志研究, 促进了理性选择模型的建构, 而理性选择模型、均衡观念、对理论设想与实际结论的实证研究以及系统性差异验证, 也可用来修正学科理论。如在分析性叙事研究项

① 常规科学 (Normal Science) 是美国科技哲学家库恩 (Thomas Kuhn) 范式理论中的概念。在范式理论中, 常规科学表现为科学在一定范式内的积累性的补充, 而非意图创造新的理论。——译者注

② 匈牙利科技哲学家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 的“精致证伪主义” (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ism) 认为, 旨在推翻某一现存理论的一次性否决实验是错误的。——译者注

目中。^①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同样可以通过形式模型、案例研究与形式理性选择模型来指导历史案例研究，并且，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大多数博弈模型都与计量分析有关，而案例研究中计量分析的运用也更为广泛。因此运用单一方法具有局限性，而这可以通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来弥补。

学者莱丁提出，在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领域中，形式理论、计量以及案例（或叙事）这三重研究方法可以综合使用，这一提议得到了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领域少数学者的响应。例如，广泛应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民主和平论研究项目（the interdemocratic peace research program），以及舒尔茨（Schultz）的民主危机中信息交流的模型；而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则有马雷斯（Mares）对欧洲国家政府与工会间博弈行为的研究；近来一些内战研究者，在运用形式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同时综合采取了计量及叙事的研究方法，这些都体现了不同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三、跨方法融合在案例选择中的应用

另外，跨方法交流的现象也表现在案例选择方法上。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当代国际政治及比较政治学者更倾向于运用理论标准来选择并评判案例，导致学者们在案例选取中出现了选择偏差^②，无视案例因变量的多样性。例如在寻找有关战争起因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案例时，仅仅研究战争最终爆发的案例而忽视战争没有爆发的案例，或是研究国际关系中的阻吓理论时，仅仅研究阻吓失败的案例。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学者们也十分警惕案例选取中的因变量问题，例如，戈迪斯（Geddes）确信这样的问题在涉及革命、通胀以及经济增长的多个常见研究中同样存在。

现代学科研究中经常提到要防止因变量的刻意选择，不过对这一点的全

① 理论与例证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案例理论研究方法的核心要素。

② 有关选择性偏差问题，可以参见：臧雷振、陈鹏：《比较政治学研究中选择性偏差问题及其识别》，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译者注

盘接受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学者认为最好选择因变量相同的案例进行研究，而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的研究也表明，相比基于密尔（Mill）法或“直觉回归法”的大样本计量研究或小样本跨案例研究而言，过程追踪与相关案例内分析更不易受案例选取偏差的影响。

可见，在研究中容易忽略未发生事件，因为研究已发生事件相对容易，同时，在政治科学中，更受关注的是冲击现存理论的既有事件。例如人们更愿意研究那些因为阻吓及情报工作失误而爆发的战争，而非被成功规避的战争。其实，未发生事件对理论发展及检验产生的影响并不小。^①而且根据研究逻辑，无论事件发生与否，都有必要解释事件发生中理论与事实的相悖性。^②

另一个问题是独立个案的理论效用。^③尽管案例研究推动了理论发展，但并不能对理论进行检验。而一些学者试图探究理论的精确预测是否仍然可能通过少数案例研究来进行验证。

单一研究案例可以对理论假说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有关情报工作失误的文献所体现的那样，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界普遍相信战略奇袭情报是难以获得的：假如美国的情报充足，珍珠港事件就可以预知或避免。不过，学者沃尔斯泰特（Wohlstetter）的单一案例研究动摇了这个假说，认为早在袭击发生前，当局已获取大量有关情报却未给予重视。进一步的，威利（Whaley，1973）的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战略奇袭情报的可预见性，他所举的例子是苏联当局收集的情报真假混杂，导致了没有对1941年的德国入侵做出正确预测。

此外，案例研究也可以用来检验民主和平理论假说的必要或充分条件。通过研究“国家边界”案例中的一些细节，可用来挑战民主和平论假说。通常认为“共同民主”是双边和平的充分条件，可是这一点受到了民主国家间

① 利普斯曼（Ripsman）和列维（Levy）在国际关系领域应用这种案例选择逻辑，试图去探析在具备种种有利条件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没有爆发预防性战争的原因。

② 研究未发生案例或“否定性案例”的问题，就是从无穷无尽的案例中选择研究案例。

③ 多数定性研究文本都在关注案例研究在理论建构与检验中的效用，但有人认为案例的理解，对案例研究本身也有促进作用。

爆发战争的单独案例的冲击，反而国家力量对比等与民主无关的变量而非民主国家本身的特性可能更适合解释民主国家间的冲突。上面的研究反映了案例研究方法的两种作用：深入分析单一案例，从而精细研究理论假说中的关键变量；对其中的因果机制进行探究。^①

四、定性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部分定性研究学者也认为进行“最大相似”与“最大差异”式的案例研究设计，可以有效地检验理论命题是否正确。这种观点是基于概率统计中的贝叶斯视角，而且摆脱了计量方法的束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案例研究都能举一反三，并且理论预期决定了例证价值。如果某个特定案例与理论假说不完全相符，而且在数据上不能满足这个假说，那么对该理论正确性的信心即被动摇。与之相似的是，如果理论的预期认为该理论很有可能确证，而且如果数据都不支持该理论的话，那么理论会受到损害。当然，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推理的逻辑结构是非对称的。缺乏“最大差异”案例对理论正确性的支持，或是缺乏“最大相似”案例的支持，会对理论造成很大影响，而“最大相似”案例对理论正确性的支持，或“最大差异”案例的缺失，仅仅是为理论推广提供了一定基础。^②

部分定性研究方法论者强调，“最大相似”及“最大差异”式的定性案例研究设计，无疑具有潜在效用。然而这种推理逻辑同样可以用于计量研究甚至实证研究，因为学者可以采取“最大相似”及“最大差异”的标准选取一小部分样本，而后运用传统的统计学方法来进行检验，从而区分出其中的

① 在民主和平论方面，重视外在效用的定量研究学者也为学科中关键理论的概念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而重视内在效用的定性研究学者则更为关注理论概念的效用，这也正是多元研究项目的优势所在。

② 艾里逊（Allison）的古巴导弹危机研究也遵循了这种逻辑，这个危机属于“最大差异”案例，而在理性国家行为模型中却属于“最大相似”案例。“最大差异”式的案例研究设计是基于“辛纳屈推论”，即如果行为者在某一事件上采取这种行为，那么也会在其他事件上采取相同的行为，而“最大可能”式案例研究的设计与之相反。